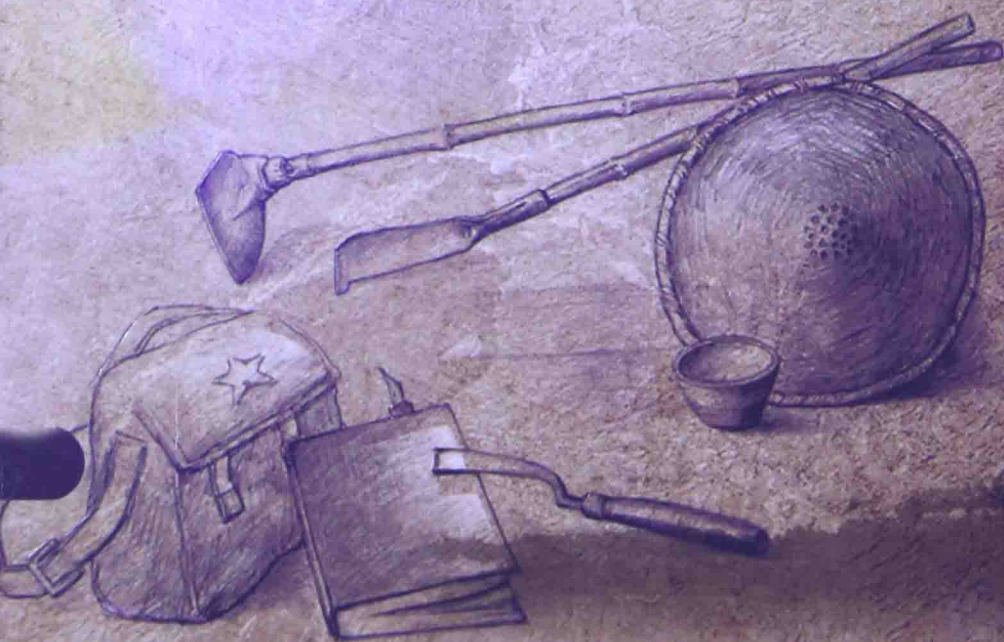


施晓宇 唐希 主编

插队往事

致我们不朽的青春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插队往事

致我们不朽的青春

施晓宇 唐希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队往事:致我们不朽的青春/施晓宇,唐希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550-0373-1

I. ①插… II. ①施…②唐… III. ①散文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2793 号

插队往事

——致我们不朽的青春

施晓宇 唐希 主编

责任编辑 谢 曦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 B 区 42 幢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373-1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插队往事

致我们不朽的青春



目录

- 陶金峰的西瓜熟了 李海音 —2
- 冷寂的辉煌 乔梅 —20
- 我的“红色恋人” 邓晨曦 —36
- 寻找回来的诗与歌 叶翔 —52
- 燃情岁月 高鲁燕 —63
- 蓦然回首 施晓宇 —79
- 小桥流水 胡萍球 —90
- 知青摇滚启示录 唐希 —96
- 古禄琐忆 林春 —108
- 建阳旧事（节选） 黄振根 —117
- 洒在可建的回忆 薛舟 —123
- 失落的珍珠 杨浩然 —142
- 顽劣与回忆 胡兆曦 —152
- 知青点里批“水浒” 潘健挺 —161
- 那土为什么濡湿了我的手 余禹 —164

无泪的冬天	李密密	—172
没有太阳的日子	林娜	—176
我要回家	丘瑜	—190
钵里焖的是狗肉	袁和平	—202
好汉“十一叉”	房向东	—205
民师“可可”	陈震	—209
苦涩的甘蔗	陈兰英	—213
追忆你卑微的生命	刘安丽	—215
村官杂记，1979	黄洁	—219
海 龙	郭祥明	—225
坝声在苍凉幽远中	朱以撒	—234
我的“小芳”	连铁峰	—239
感激一生	孙原	—244
旧村觅踪	马照南	—248
后记		—251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

插队往事 致我们不朽的青春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无数青年学子怀揣梦想，走进了大学校园。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许多青年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插队，开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也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陶金峰的西瓜熟了

——一位“扎根派”知青的辛酸亲历

李海音

1976年初夏，泰宁县上青公社陶金峰的西瓜熟了。

在杂草灌木丛生的向阳荒坡上，我们开垦出了一片类似梯田的十多亩坡地，坡地里爬满绿茵茵、毛茸茸的藤蔓植物，植物开花结果，结出了一地大大小小、表皮颜色和花斑各不相同的球状物。这，就是西瓜。这西瓜，就是我们“上青公社五四青年林场”种植的。

1976年，是我插队到闽北山区当知青的第七个年头，也是我们几位新老知青发誓“扎根农村一辈子”、共同创建青年林场的第二个年头。

1976年，地处闽西北山区的泰宁县，还是个十分偏僻和贫穷的山区小县，全县人口仅七万余人，开天辟地以来没人种植过西瓜这玩意。非但如此，绝大多数山里人，还没吃过西瓜，没见过西瓜，甚至没听说过西瓜。我们林场种植的这片硕果累累的瓜园，自然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勾引出许多人的馋涎。人们像发现了新大陆，奔走相告：“林场种的西瓜要熟了！”

对于这片瓜园，我们林场的知青和山里青年，自然也寄寓了许多希望。我们憧憬，我们幻想，盼望着能将这些西瓜运进县城去出售，以便能买回一条废牛宰了让数月没吃一片肉的我们尝尝荤，或者让我们每天中午一人一小碗的清汤菜中有些油花……而时任林场负责人的我，则希望能买回一批水泥，铺上我们林场宿舍的泥地。然而，接下来发生一连串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彻底粉碎了我们的美梦。令三十年后今天的我仍心酸不已，并以此故事写出了一部电影剧本，片名就叫《西瓜熟了》。

1976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绝对是个永生不会释怀的年头。

二

“海音，你要是想有出息，就得反潮流。”

当年大队“财粮”肖维新的这一句话，使我当上了泰宁县著名的“知青扎根派”，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是1975年2月的一天，天上飘着冰冷冰冷的细雨。上青公社崇际大队的代销代购店里空无一人，我坐在柜台内吹着笛子《扬鞭跃马运粮忙》，大队“财粮”肖维新趑进门来，翻看了一会儿当天的报纸，对我说了以上的话。

如今看来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当年却像晴天霹雳，一下把我给怔住了。我放下手中的竹笛，呆愣在那儿，货柜的玻璃映出我惨白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脸。

那时，正是二十四岁的我最苦闷的时期。

我是在1969年2月8日，随我哥哥李田青的福州三中同学，一起到崇际大队大坪生产队插队落户的。那年隆冬，我十七岁的妹妹李百梅，带上辍学的十六岁的弟弟李密密，也到大坪来投奔我们，当上了知青。那时小小的大坪村，一下子有了八名知青。日子虽艰辛，但有同类做伴，倒也不觉得苦闷。

我哥哥李田青已于1972年招工去了三明林械厂，弟弟李密密也在1974年进了泰宁县合成氨厂。到了1975年早春，妹妹李百梅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大坪生产队的知青已人去楼空。更令人难受的是，当年同来崇际大队的三四十位知青全部都已离去，仅仅留下了我一个孤家寡人。

记得1974年秋天，最后三位知青离去时，他们结伴到代销代购店来看我。林立、张绍周、刘焰，他们都是顶替父母亲的工作，“补员”回福州的。在上青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和林立、刘焰是后台的“铁三角”。我吹竹笛，林立拉手风琴，刘焰则是京胡、板胡、二胡样样会。每年入冬，我们都不能回福州过年，我们集结在公社排练节目，到各个大队去巡回演出。常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我们参加了几次全县的汇演，曾轰动过县城。我还因此被选入三明地区的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并参加1973年的省城大汇演，曾在福州人民剧场和台江影剧院吹奏过，留下过值得夸耀的回忆……就是在没参加宣传队的日子里，我们也经常相约，各带乐器，跋涉数里山路，聚在一起，演奏古今中外的名曲，让顽强的乐声灌满萧瑟的知青小楼……可是，他们这么一走，公社的文宣队就得塌台，我也从此失去了知音，我心中的悲凉是无

人能够体会的。

按理说，本大队的知青都走光了，下一个上调的人应该是本人了。但是，我妹妹李百梅在公社文化站，也在等着上调，我应该让她先走。然而在公社干部心里，不免这样想：你们李家兄弟妹四个，已走了一半，而上青其他大队的知青还有许多没走哩。如此等下去，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哇？再说，我是个高度近视，原先的四百度近视眼，在大坪几年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写作、替山里人读报、记工分，度数已翻了一倍多。县医院的医生曾恐吓说我将瞎眼，真要被推荐招工，哪个工厂会要？

我是经大队党支部支委会讨论，决定让我进大队代销代购店的。那时，我还在三明业余文宣队，参加赴地区各县城的巡回演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决定我的命运的。我只记得，我们巡回到泰宁县城时，有本大队的知青告诉我，叫我演出结束后，尽快从三明返回，大队有好事安排我去做。没错，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大队开办的代销代购店的确是人人向往的好地方。进店工作不仅意味着每天都有大队计给的“脱产干部”的最高工分，还意味着你控制着全大队人口（包括支书以及支书的家庭和亲友）的烟票、糖票、布票的供应，同时把持着所有鸡鸭蛋、草药材、山货、皮毛的收购。崇际大队的代销店，位于大队所在地的际下村，设在马路边上的一幢旧粮库里，还有电灯，是当时全公社惟一的“双人店”，还是三明地区的模范店。我揣想，推荐本人进店的，一定是大坪村的肖毓崇和肖其名。肖毓崇是大队的民兵营长，我参加地区文宣队前，是大坪村的保管员。有一天深夜，肖毓崇到知青小楼找我，劝我拿出一些当天生产队收摘的“水”（即还未完全成熟的）花生，和我弟弟李密密三个人一起偷享了；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被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尽管我暗暗咽着饥饿的唾液，但也因此给他留下了忠诚老实的强烈印象。肖其名是大队的会计，我曾和他一起承接过大坪最偏远的地块的收割。在那个名叫南排的山垅田里，我挑过一百四十来斤的稻谷，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小路挑回村里，他足以证明我能吃苦耐劳。

果然，我从三明一回到大坪村，就被叫到大队去谈话。他们叫我带上行李铺盖，第二天就到大队的代销代购店报到，接受店长肖九廷的领导，我就这样成了一名“店小二”。当年三十来岁的肖九廷，是际下本村人，曾在县城读过中学，在山里人眼里绝对是个精明人，这个店铺就是他经手创办的，并稳坐在这把交椅上。平心而论，肖九廷对我挺不错的，他不仅教会了我全套经商之术，还经常非常诚恳地教导我不要和那些落魄的没有前途的人交往。

从歌舞升平的文宣队，一下来到油盐酱醋之中，我刚当“店小二”时十分不习惯，不久就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在这里，我学会了每当有人进店，一眼就看穿他兜里揣着几文钱，想买什么，能有几多利润；学会了用剪刀不出声地宰杀鸡鸭，并吃得点滴不剩；还学会了每晚将鸡蛋塞进开水瓶的本领，第二天早晨取了吃的绝技。在这里，我知道了人为了活下去还要活得滋润，都能干出些什么来的真谛。可是，衣食无忧的我，更感到了思想上无法排遣的痛苦。难道，我就这样随俗下去，默默等待着别人对我命运的安排？

“海音，你要是想有出息，就得反潮流。”

是肖维新的这一句话，给我指出了一条道路。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黄帅正如日中天，知青“扎根农村”的热潮正风起云涌。是肖维新提醒了我，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当一个名符其实的知青“扎根派”！

就这样，我去撺掇几位老知青，试图创建一个能让我们终身待下来的“知青点”，我们的“太阳城”，我们的“乌托邦”。

于是，便有了“上青公社五四青年林场”。

于是，便有了陶金峰的那十几亩瓜园。

三

累累的硕果，凝结着青年的心血。

说起种瓜的故事，很长很长。

1975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三明地区林业局组织的林业观摩会，参观了尤溪、明溪、永安、大田等县的人工林和造林山场。看到了大片大片已郁闭的人工林，我激动不已，并深感自己创办林场走对了人生之路。

在这次会上，我结识了泰宁县林业局的副局长老林，这位莆田籍的老林业人对我也十分赏识。看到了其他县的林地都套种了芝麻、金针等经济作物，我们也一起探讨如何在泰宁的用材林基地地开展“以短养长”。因为规划中的上青公社“万亩用材林基地”的山场大都是沙砾土，十分贫瘠，为此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哎，小李，种西瓜，你们可以试种西瓜！”忽然，老林高兴地一拍脑袋，叫了起来。

“种西瓜？”我疑惑地睁大了眼睛，“在山高水冷的泰宁也能种西瓜？”

“试试吧，凡事总有个开头！”老林很有信心地回答，“你们不是喜欢反潮流么？”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了上青的林场，投入了紧张烦累的育杉木苗、规划造林山场、筹建林场场部的工作，不久就把这事当作笑谈给忘了。

想不到，1976年的春节刚过，老林就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小布袋的各色西瓜种子，还有一本如何种植西瓜的小册子。老林让一位回河南老家探亲的老工人，带回了这些西瓜种子。

那时，我们的林场场部已经落成，我们都搬进了新居，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是寄宿在一个名叫胜前的小猎户村。在场部的上方坡上，我们刚开垦了十几亩坡地，已种下了柑桔苗，刚好可以用来套种西瓜。而那时，我们送去参加地区农校“林业技术员培训班”的山里青年肖德良，参加完三个月的培训，刚刚回到林场，他自告奋勇要担任种西瓜的技术指导。

“啧啧，这就是西瓜？！”陈贵寿老爹问，他不敢相信在干燥贫瘠的山坡上，能结出这么水灵灵的瓜果。

十几个知青和山里青年的光脑壳，凑在那本小册子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好奇地看着图片上的硕果，他们的脑袋就有点儿像毛茸茸的西瓜。

陈贵寿老爹听说过西瓜，可是没尝过。他是土改时期的民兵队长，“文化大革命”前在大队当支书。问这句话时他五十来岁，身材魁梧，一脸连鬓络腮胡。

“栽这种东西，还不够鸟啄了去，野猪啃了去！”曹玉书也这么认定。四十岁的他是胜前村的著名猎手，我们共同创建林场的肝胆兄弟。他中等个子，剽悍精干。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试试！”被老林局长感动的我，劝说他俩。最后他俩都同意了，毕竟在一年多共同创建林场的日子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贵寿老爹情同父子，和玉书情同兄弟。贵寿老爹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没有多生一个女儿，好让她嫁给我。而我和玉书哥的情谊，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前两年他还带着朋友，到福州来看我，在我家住了好些天。而我每次去泰宁，总要和他见上一面。

认识统一后，我们就开始分头行动。

我带领一部分青年，在坡地里按行距，挖出了一个个五六十公分宽、三四十公分深的土坑。贵寿老爹带领一部分人，在场部起猪圈、粪坑，准备基

肥。玉书哥则带领另一部分人，上山砍烧茅草，积草木灰，准备做培养土。而女知青阿萍（化名）和山村女青年严秀香，则留在场部食堂里，坐在饭桌旁，剪裁旧报纸，糊成一个个培养杯。

我们林场原来清一色都是男性，后来因为接受公社书记林洪展交给的任务，接收了女知青阿萍，为了她的生活方便，我们还招来了严秀香和她同住，并特地盖了一间女茅房。

阿萍是1974年到上青公社南山大队插队的福州知青，出身是贫苦的煤店行业工人家庭。她身材矮小，长相也很一般，但性格爽朗，笑声很动听。阿萍一来，就很得大队领导看重，让她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还兼任大队医疗站的“赤脚医生”。1974年冬天，上青公社“农业学大寨”的重头戏是挖数十里长的“跃进渠”，两三千名劳力全都集中到高山老林里去“战天斗地”。当时，身为“店小二”的我，挑着货郎担去工地“支农”，看到阿萍在那里呼风唤雨，非常风光。据说，大队党支部书记正培养她入党，这位书记是个复员军人，当年三十刚出头，他长相英俊，初通文化，行事果断，前途无量。可就是这位书记，和阿萍发生了性关系，又被和他有矛盾的女副支书组织知青和民兵逮个正着。这个悲惨的事件，发生在1975年的隆冬，那时由于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强奸女知青是要判死刑的。阿萍哭着跑到公社，说她不是被强奸，而是自愿的。英俊的党支书，因此只判了七年徒刑，但支书老婆却携亲友打上门来，阿萍就这样来到了我们林场，无奈地和“扎根派”牵连在一起。清一色男性的深山，忽然降临了两位青春女子，关于西瓜熟了的故事，也就自然增添了些许色彩。

在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里，林场全体人员没出工，集中在食堂里。我们流水作业，往纸杯里装上搅拌好的、干湿适当的培养土，然后点上三四粒浸泡过的西瓜种子，覆上一层草木灰，在食堂外的朝阳山墙下整整齐齐地摆成一片，再用洒水壶浇上一层水，最后再盖上一层塑料薄膜。

“海音，真要有西瓜收获，你说会好卖吗？”贵寿老爹这样问我。

“会好卖的，物以稀为贵嘛！”我夸下海口，“运到城关去，别说卖五分钱一斤，就是卖三分也好！”

“哇，如果能收十万斤，那就是三千元票子啊！”贵寿老爹惊叹。

在当年的泰宁山区，三千元人民币不啻于一笔巨款，能买五六十条废牛，能讨五六个老婆。

因此，一个星期过后，正是清明节的前夕，当我们掀开塑料薄膜，看到

了一片绿茵茵有如地毯的新苗，林场场部一阵欢声雷动。

四

我决心“反潮流”，立志当“扎根派”后，就去寻找志同道合者。

在大坪村的知青小楼里，我读过昂利·圣西门和夏尔·傅立叶的《乌托邦》《太阳城》。在此之前，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就教导过我们，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组成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思想体系核心的三大部分之一。圣西门、傅立叶所描述的社会形态，深深吸引了我，在那个想象中的社会里，人人自由平等，各尽其力，各取所需，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世界呵！

我立志当“扎根派”，表面上说的是扎根农村，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我早就厌倦了这个可怕的人与人尔虞我诈、残酷斗争的社会，除了向往乌托邦、太阳城，我还仰慕俄国的“民粹派”，向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渴望过“五柳先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我想找到一群志同道合者，我们一起躲进深山，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一个与世无争、丰衣足食的家园；我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在农村也可以生活得不比进城当工人差。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想。有理想，有人生的追求目标，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老三届”红卫兵知青的共同特点。

说起红卫兵，现在的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出现的是青面獠牙、身穿军装、手挥铜扣皮带打人的暴徒形象，而事实绝非如此。否则，我们这代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和春风的共和国同龄人，岂不一夜之间都成了“喝狼奶长大”的法西斯匪徒？打人、批斗人，只是一小部分红卫兵在一小部分时间段里的作为，而绝大多数红卫兵都采取的是理性的批判行为。

是上山下乡，又一次点燃了我们的希望，我们这些“老三届”红卫兵知青，似乎又有了理想。相对以后来插队的知青，我们这批人偷鸡摸狗的事较少，更绝少乱搞男女关系的。插队初期，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人人埋头苦干，都想干一番事业，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要不然也不会第一年只拿半劳力的工分，而第二年就几乎都成了全劳力，都拿十个工分了。要知道，当年拿多少底分，是要在全队劳力参加的会上，每个人“自报公议”的。但是，从1971年开始的招工、招生、招干中，讲出身，走后门，拉关系，又一次粉碎了我们的理想，使我们明白所谓伟大的上山下

乡运动，不过是某个领导者的心血来潮，或者是某种权宜之计。人人开始为自己的出路盘算，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当然搞这一套也是红卫兵知青所擅长的，非“老三届”知青则望尘莫及。

我很快就找到了几个知青，他们是吴元培、林小雄、林思祖、陈卫东、张文华。

吴元培和林小雄，也是1969年2月和我一起来泰宁插队的老知青，林思祖是泰宁本县城下来的老知青，而陈卫东与张文华则是1974年从福州来插队的新知青。当时，作为知青老先进的吴元培，入党后已招干进了上青公社党委会，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林小雄插队多年后，当上了民办代课教师，在南山大队黄土岭生产队任教；林思祖也有了不错的栖身工作，在公社供销社当农资仓库仓管员。奇怪的是，当我们凑在一起，畅谈创建心中的“太阳城”时，他们都表示愿意放弃已取得的，重新拿起锄头，并激动得夜不能寐。

“扎根”方案酝酿成熟后，我们就一起去找公社书记林洪展，并在上青小镇最显要的大字报栏上贴出了《给全公社知识青年的倡议书》，呼吁知青加入我们的队伍。

公社书记林洪展表示坚决支持，并说陈贵寿老爹他们已在草创公社林场，我们可以加入，把林场办成“扎根派”的大本营。下放干部、公社林业员龚人佐，更是表示热烈欢迎，让我们直接去找陈贵寿老爹。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在胜前村的豆腐坊里找到了贵寿老爹。他也非常欢迎我们加入，但满是络腮胡的脸上带着疑惑的笑容。

当贵寿老爹知道我们都还神经正常，就戴上斗笠，带我们从胜前村后的石径上登上了高高的陶金峰，去浏览将来林场的领地，和已划拨给林场育苗的那几块山垌田。接着，又从后山的小路，沿着长满野生榛子树的马鞭峒翻下山来，回到了胜前村。一个上午的浏览，看到条件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想，大家都十分满意。

就这样，又经过一番折腾后，1975年“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我们几个人挑着简单的行李物品“第二次插队”，回归自然，来到了胜前村，开始了“扎根派”的新事业。在多次幻灭之后，我们又扯起了理想的风帆。

为了纪念这一天，林场的公章刻的就是“上青公社五四青年林场”。

遗憾的是，公社党委没有同意吴元培的申请，他仍做公社副主任，分管林业和知青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他调离上青，只要林场有事，他就会出现。

五

“清明节”过后，营养纸袋装的西瓜苗，被一一种植到备下的土坑里。

一阵又一阵淅淅沥沥的春雨，滋润着上青的山山水水，间或出现的朦胧太阳，又洒下温暖的阳光，翠绿的西瓜苗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势喜人。

这一天，我们正在西瓜地里锄草，忽然发现情况不妙。

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类似天牛的黑色小甲虫，出现在尺把长的瓜苗上，正在贪婪地吞噬着鲜嫩的碧绿。许多瓜苗的叶片被吃成网状，有的还吃断了主茎！

我们没有那本西瓜种植手册上所开列的农药，我就让肖德良去喷药性最温良的“乐果”。一般我们喷杀自留地蔬菜长的害虫，用的都是这种农药。

肖德良取来喷雾器，兑上“乐果”，花了半天时间，才把瓜地喷了一遍。

可是没用，喷药时那些黑色小天牛通通飞走，药水一干，它们又飞了回来，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毫发无损！

“咦，治它不死？那就洒‘六六六’！”我气急败坏地喊。

“六六六”是一种剧毒的农药粉，不久就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

“使不得，使不得！”贵寿老爹说，“这药粉性燥，会烧死瓜苗的！”

“就是治死了虫子，这种西瓜也吃不得。”玉书哥也这么说。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吃光瓜苗，先试它几兜再说。”我仍不死心。

傍晚，在虫害最严重的几兜瓜苗上，洒下了“六六六”粉，看到那些来不及逃走的小黑天牛，跌下瓜苗，在痛苦地垂死挣扎，我心中充满了快意。

第二天清早，我一起床，就直奔瓜地。

果不其然，那几兜瓜苗已经蔫蔫地垂下了茎干和叶片，叶片上还出现了火燎过似的痕迹，待太阳一升起，这几兜瓜苗全都枯萎了。

我追悔莫及，一筹莫展。总不能让林场所有人守着这十几亩瓜地，天天用手捉虫，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

“嗨，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天吃早饭时，贵寿老爹忽然一插饭桌。

“你想到了什么？”垂头丧气的我问。

贵寿老爹回答：“我爹教给我一个秘方，我还没有使用过咧。”

我来了兴趣：“什么秘方？”

贵寿老爹说：“去挖‘断肠草’的根，剥下皮来，晒干碾成粉，洒在瓜叶

上，瓜苗会吸收毒性，害虫一吃就死，而且不敢再来沾！”

我半信半疑：“哦，真的？那赶紧试试看。”

这一天，贵寿老爹和玉书哥，分头带着山里青年曹元盛、杨子华等人，两人一组，都去挖“断肠草”的根。

“断肠草”是泰宁山区常见的一种多年生草本藤状植物，在河边溪畔常生得茂盛葱茏。我们刚来插队，农民兄弟告诉我们，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山里人不堪饥饿，就因生吃“断肠草”而魂归西天。

这一天傍晚，贵寿老爹和玉书哥回来，他们挖回的“断肠草”根皮，足有几箩筐。

第二天，刚好出了大太阳，我们赶紧将“断肠草”根皮倒在晒谷席上暴晒。

几天后，我们将“断肠草”根皮的干粉，逐兜洒到了西瓜苗上。

第二天，死了一地的黑色小天牛，没死的全都绝了迹！

虫患刚过，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那就是干旱。

1976年的仲春特别温暖，“谷雨”过后，接着一个个都是艳阳天。西瓜地里，瓜苗刚刚开始从虫害中恢复，又被晒得蔫头蔫脑。

全场总动员！

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就让肖德良吹响哨子，把睡眠惺忪的人们全都叫醒。人们或挑水桶、尿桶，或提勾桶，或端脸盆，全都到离林场场部两百多米远的泉眼处去弄水，将水弄到瓜地里浇瓜苗。虽然距离并不太远，但上下陡直，要翻一个小坡，人人累得七喘八哈。

刚开始，每天清晨浇一次水，还能保证瓜苗的生长。半个月过后，必须一早一晚浇两次水，才能勉强维持瓜苗不被晒死。

“算了，我们不吃那废牛肉，也不稀罕菜里有没有油，饶了我们吧！”山里青年都叫苦连天。

是的，育树苗、开垦“造林样板山”、测绘造林山场、测量林场公路，还有种水田，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大家都已不堪重负了。

“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玉书哥对我和贵寿老爹说，“那就是赶快架竹管去接水！”

架竹管到山上的泉水那里，接水到食堂，是我们早已规划的事。不过，我们本来想等冬天稍闲时再做这件事，现在看来只得提前了。从泉水那里接水到食堂，路线刚好经过瓜地，只要在那里开个临时的“水龙头”，浇瓜苗那

可就省力、简便多了。

第二天，全场男员工出动，去砍毛竹，任务是一天每人四根，要求是每根必须碗口粗、四米长。这种大毛竹，附近山场没有，要沿着马鞭峒翻过陶金峰，到三地大队的山场上去砍，来回要走十多里山路。

两天后，当清澈的山泉水顺着竹管，流淌进瓜地和林场食堂，看到瓜苗有救了，看到从此免除轮流为食堂挑水之苦，人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

这一年，到了“五四”青年节的这一天，我们瓜地里的瓜藤上，结出了许许多多拳头般大的小西瓜，看来丰收有望了。

可是，这时我们又遇到了顽敌，那就是野猪。

六

除了第一批“扎根派”知青外，后来又有吴秀晖、蔡立、李钢等数批十几名知青来到林场，加入了绿色的事业。他们都是自己报名，由各大队推荐来的。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林场才创办短短两年，就有了二十来亩育苗地，开垦了两百多亩“样板山”，种下了杉、松和楠、樟、檫、水杉等珍贵树种，以及油茶、茶树、柑橘等经济树种。我们还亲手建起了包括宿舍、食堂、仓库、饲养场在内五幢两千平方米的建筑，作为林场场部……我们被评为泰宁县先进“知青点”，团支部被评为三明地区先进团支部。

林场的场部场址，是我和贵寿老爹经反复勘查后，才选定下来的。那是陶金峰山麓的一个小山坳，原先长满了杂灌和几棵瘦松，还有几座荒坟。

林场所有的建筑墙体都是干打垒建起来的，都是我和上青街一个叫裕财的舂墙师傅，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用木槌一杵一杵舂出来的。由此，这位裕财老师傅还立意叫我做他的帮手，一起去各村打工赚钱，当然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林场的建筑，内外墙全都刷上了白石灰，宿舍安装了玻璃窗，还钉上了天花板，这在当时的泰宁山区可谓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群。在大山的山腰上，忽然出现了这一排白晃晃的建筑，遥遥可见，就像是巨大的广告牌。每次我外出回到林场，心里都会油然升起自豪感。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扎根”愿望已经部分实现了，“太阳城”、“乌托邦”就在我们眼前，而事实绝非如此。

首先，我们无法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更无法做到与世无争。